

新中国诞生这天蒋介石忙什么

怕受万年唾骂,放弃空袭计划



资料图片

1949年10月1日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之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举国欢庆,华夏沸腾。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铭记的重要时刻,尤其是对这个人,似乎更加难忘,此人就是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此时此刻,他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位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是如何度过这刻骨铭心的一天的?

放弃空袭计划 怕受万年唾骂

1949年10月1日清晨。

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蒋介石在广州的居所。

蒋介石的官邸死一般寂静。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正在思考的蒋介石。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已经打过几次电话了,但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每一次,周至柔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

“校长,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周至柔焦急地向蒋介石说出了最后的底线。

蒋介石猛地站起身,对着话筒说:“任务取消。”

周至柔大惑不解,问:“校长,请再考虑考虑,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保证完成任务。”

“任务取消。”蒋介石又一次更加坚定地重复一句,然后放下电话筒,慢慢地坐回沙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不过,在今天看来,蒋介石倒是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取消了用空袭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计划。这个计划蒋介石与周至柔密谋了很久,也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蒋介石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取消这一计划呢?因为他最终明白:即使他把天安门地区炸个稀巴烂,破坏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得到的只能是中国人民的更加愤恨和美国人对他黔驴技穷的蔑视。而且,天安门广场与故宫相连,如果把故宫炸了,把北京的古建筑毁坏了,自己就成了烧阿房宫的项羽和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了,这样会招致全中华民族的指责和唾弃,成为千古罪人。所以,蒋介石最终放弃了破坏计划。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孤注一掷冒险一搏的警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机全部带弹受阅,这在中外阅兵史上是极罕见的。

越洋电话 唯一的浮木

蒋介石还是寄希望于美国政府对他继续支持和对新中国政府遏制的。此刻的蒋介石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一个消息。通过总机,他接通了美国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夫人宋美龄熟悉的声音,蒋介石

心中一阵兴奋。

当宋美龄讲到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而不承认北京政权时,蒋介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连声说:“好!好!好!”实际上,蒋介石深知美国方面的这种支持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可到了这等狼狈境地的他权且将这一消息作为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安慰剂。

为了争取美国更多的援助,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但迎接她的尽是一些美国的二流官员。深感失落的宋美龄在发回国内的第一封电报上说:“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

此次,宋美龄访美的目的有三:其一,是让美国方面明确表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其二,是得到一大批物质援助;其三,是请一位高级军事家赴华考察中国局势,人选是麦克阿瑟将军。那么,这三项明确的目标如愿以偿了吗?答案是:争取到的一点援助经费,早已被蒋夫人一年的游说花费一空,只是经过中央银行转手后又重新流回美国。请麦克阿瑟将军赴华考察的意见被否决。所幸宋美龄没有无功而返,她最终说动了美国政府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实现了重要的政治目的。因此,蒋介石还是比较欣慰的,尽管这个结果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新中国成立不久,苏联政府就宣布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这无异于给蒋介石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蒋介

石忧虑地说:“今后俄帝必与共党订立军事同盟,助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

院中踱步 难掩无限失落

1949年10月1日上午。

心情烦乱的蒋介石来到院中,下野已经8个多月的他在院子里来来回踱着方步,低头不语,阴沉沉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虽然刚才收音机里传出的共产党新闻,将他称为“蒋贼介石”,使他非常生气,但让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对付共产党,而是要尽快复职就任总统,依靠广州或台湾,东山再起。可是,此时总统李宗仁就是不交权,蒋介石十分恼火。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和您谈话。”李宗仁一开口就掷地有声,蒋介石顿感来者不善。

蒋介石默坐着听李宗仁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尴尬。

李宗仁见蒋介石低头静听如此严厉的诘责尚能容忍,没有咆哮和反唇置辩,遂不再多说,起身告辞。蒋介石一直把李宗仁送到楼下。反身上楼的蒋介石气得面色铁青,忍无可忍,咆哮道:“娘希匹,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李宗仁是个什么东西,也来教训我,我叫你立刻滚蛋。”

次年李宗仁以“胃疾剧重”为由,赴美就医。3月1日蒋介石宣布继续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尽失人心 最后希望破灭

1949年10月1日下午。蒋介石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着中共的新闻,每听到他的许多老部下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的消息时,蒋介石就愤然站起,破口大骂:“娘希匹,一群混蛋,老蒋待你们不薄,一群卖身求荣的王八蛋!”除此之外,蒋介石没有说过其他的话。

据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蒋介石的失败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事实上,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已成为大势所趋。

夜深了。然而此刻的蒋介石仍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烦躁地反复调换着收音机频率。

这时,收音机里报道了一则北京破获一起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的消息:“阴谋在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活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木剑青,于20日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该犯为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化名王建坤,于9月2日来京……经北京市公安局连日侦查,特务匪犯木剑青已初步供出该案为国民党中统局有计划之捣乱活动……”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一股无名火直蹿上脑门,他不由得大发雷霆:“一群废物!”

夜色越来越深。对蒋介石来说,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也许是他在一生中最漫长、最难熬、最刻骨铭心的一天吧。

(来源:党史纵横)

1970年重建天安门揭秘

30多年前重建天安门时,我国正处在内忧(“文化大革命”)外患(中苏关系紧张)的形势下。不仅北京市市民不知道,就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园、文化宫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被苇席围起的天安门那里在干什么。

承担这次任务的是北京市五建公司。参加者均为“根正苗红”、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拆城楼前首先进行测量,北京市五建公司选派了木工连组长姚来泉配合测量局的同志工作。姚师傅当时不到40岁,干了20多年的木工,是北京市数届劳模。后来将测量的数据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天安门城楼除底座是砖混结构外,整个城楼为木结构。按指挥部命令,姚师傅要找出正中的脊瓦。找到那块脊瓦后,指挥部领导、专家及公安上了楼顶。领导指着中间黄色的琉璃瓦对姚师傅说,把它砸开。姚师傅用撬棍连撬带砸,瓦碎,露出一个30厘米见方的木盒,尽管很旧,但上面清晰地雕着一对精美的二龙戏珠图案。领导示意他打开。姚师傅用手叩叩木盒的面说,这是金丝楠木的,用撬棍轻轻一截,木盒开了。姚师傅伸出手臂,拿出来一块“铜疙瘩”。专家拿起看,尽管光泽不那么亮了,但却实实在在是个金元宝!姚师傅又伸手摸,凉凉的,好像是块石头,一看是块拇指大的红宝石!又摸,是一粒粒像红铅笔头似的东西,手指一

捻,变成朱红色粉状物,若离若聚。当时60多岁的中国古建专家郭老拿着粉末状的朱砂说,这是百年真朱砂啊!此外还有五彩粮:黄豆、高粱、黑豆、谷子和玉米。

后来,新建城楼在原放“宝盒”的地方由姚师傅放了一块高17厘米、宽12厘米、厚3厘米的汉白玉石,上面竖着刻有时间。

天安门城楼被拆下的木料堆满天安门的后面和端门大院,拆下的斗、拱等相互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不管多大的木结构都找不出一根钉子,只有网板上有些钉子。工人用吊带先将城楼西南一个整角吊起,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根,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后来把拆下的每一根木料都按顺序编号,画草图、拍照片,并写清内外、上、下、左、右,把拆下的东西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直到弄明白为止。

正脊两端的螭吻,原为

油漆彩画上,所有描龙画凤都经过严格的13道工序。菱花格扇过去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这次反复研究,试制成了菱花格扇加工机,提高工效150倍。最后贴金箔,重修的城楼共用去6公斤黄金。此金箔全部为进口,不能直接用手拿,否则金会嵌进肉皮。油工们小心地用竹夹一张张夹起,敷在未干的油漆上,再用细毛笔一点点捋平……

来源:《齐鲁晚报》



资料图片

1929年“废除中医案”事件

近年来,关于中医的生存和发展的讨论很多,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医学界内部,而是与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纠缠在一起。实际上,早在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到上世纪20年代初,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在学理上不具有科学精神,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岩、诸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所列废止中医之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

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便是“废止中医案”。

尽管如此,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议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上海各大报馆的舆论支持。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上海的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卫生部,请求取消议案。

中医界反抗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

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充满了火药味。

3月17日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遂组成赴京请愿团,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之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

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中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这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左玉河 来源:中华读书报)